

安徽青阳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张爱冰

(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合肥 230601)

内容提要:安徽青阳县汪村出土青铜器单元明确、器物组合完整、器形风格新颖、文化内涵丰富。通过器物组合、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可以拟定为西周晚期,其形制特征反映了皖南与宁镇、江北以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汪村出土青铜器是构建皖南沿江地区西周青铜器编年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青阳汪村 青铜器 西周 青铜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1979年安徽省青阳县庙前镇汪村窖藏出土了一组青铜器12件,分别为附耳窃曲纹鼎1件、小口罐形鼎1件、龙耳尊2件、牺首尊1件、鱼龙纹盘1件、编钟4件、戈1件和矛1件^[1]。本组青铜器出土单元明确,器物组合完整,器形风格新颖,文化内涵丰富,一向为学界所关注。本组青铜器的年代,原发掘简报拟定为西周晚期;刘兴先生认为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2];肖梦龙等先生认为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早期^[3];李国梁先生认为在春秋中期^[4];刘建国先生认为在春秋前期^[5]。汪村所出龙耳尊的年代,杜迺生先生认为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期^[6];施劲松先生认为相当于西周晚期^[7]。本文拟重新考察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形制、变化和年代,进而讨论其文化因素构成以及所反映出的西周、春秋时期皖南、宁镇和江北地区青铜文化的空间格局。6件青铜容器为本文观察的重点,乐器和兵器有另文陈述。

一 附耳窃曲纹鼎

附耳窃曲纹鼎 折沿,浅圆腹,底近平。长方形穿耳,耳外侧饰鳞纹,器身饰一周无目窃曲纹。通高18.3、口径26.3、腹深9厘米(图一:1、2、3)。

窃曲纹是一种由鸟纹、夔纹或龙纹变形演化而成的纹饰,所以亦称变形兽体纹。窃曲纹通常以目形为中心,两端各有一段分别向上或向下卷

曲的线条,也有不少窃曲纹省略了中间的目形纹。依王世民等先生分析,此鼎所饰窃曲纹由长条形回状曲线构成,其间或补以眉形弧线,可能出自分尾的鸟纹或夔纹,年代在西周中期至晚期^[8]。此鼎所饰窃曲纹呈边线勾勒的圆折角形式,在皖南及江北西周晚期青铜器中多次出现,颇具地域特征。

饰窃曲纹的附耳蹄足鼎繁昌县孙村镇出土过1件,但为球腹,即器腹圆底呈半圆球状。口下饰一周有目窃曲纹,再下又有一道弦纹。三蹄足上端饰短扉棱兽面纹^[9]。球腹蹄足鼎在西周中晚期出现,西周晚期最为常见。王世民等先生认为:孙村鼎所饰窃曲纹中间为一目,两侧连接两个长方形回形曲线,左右对称,可能出自象鼻龙纹,最早流行于西周中期之初,西周晚期仍然多见^[10]。

因此,依据其所饰窃曲纹的形式,汪村附耳浅圆腹蹄足鼎的年代可以早到西周晚期。

二 小口罐形鼎

小口罐形鼎 直口,鼓腹,蹄足。肩附双环耳。器身上部饰一周窃曲纹,下部饰大小相间垂叶三角纹,内填窃曲纹。足上端饰短扉棱兽面纹,下端再饰两道凸弦纹。通高25.5、口径18.4、最大腹径26.4、腹深16.4厘米(图二:1、2、3)。

此鼎所饰窃曲纹的形式和变化,与上述附耳蹄足鼎所饰基本相同。

收稿日期 2010-10-26

作者简介 张爱冰(1961~),男,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考古、青铜器。

基金项目 本研究获得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09sk041)和安徽大学人才队伍建设经费资助。

皖南还出土过2件小口罐形鼎,可资参照。铜陵市区出土1件,直口,鼓腹,柱足。器身两侧附大型双环耳,身饰鳞纹,耳端饰双角兽面纹,疑为牛首。器腹饰一周窃曲纹,其下有垂叶三角纹,内填云纹。柱足上端饰短扉^[11]。依王世民等先生分析,此鼎所饰窃曲纹大致由两组相互连结的回形曲线组成一个纹饰单元,一个有目,一个无目,应出自分尾的鸟纹和夔纹,年代推定为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12]。此器柱足、牛首饰和鳞纹样式等形式要素亦可到西周中晚期。铜陵罐形鼎造型、窃曲纹和垂叶三角纹的布局 and 构图样式、足端短扉棱等均与汪村鼎相似。

繁昌县汤家山出土1件,形制略有区别,直口,广肩,扁鼓腹,双耳立于肩上略外撇,三蹄足。弧拱盖有直裙,盖附4只矩形钮。肩部饰一周有目窃曲纹,间以蝶形纹,上下各有一周凸弦纹作界栏,其下又有一周凸弦纹^[13]。此鼎所饰窃曲纹线条较方正,尾端无钩卷,亦有边线勾勒。王世民等先生认为:此式窃曲纹突出一目,目纹周边有牙状饰,两端再延伸回形曲线,可能出自象鼻龙纹,最早流行西周中期之初,西周晚期仍然多见^[14]。汤家山组伴出兽面纹连体甗、乳钉纹方鼎、重环纹球腹鼎和鱼龙纹盘等,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

春秋以后,江北区的确有小口罐形鼎传统。舒城县河口镇出土1件,扁鼓腹,长方形穿耳立于肩上,三蹄足。平盖有直裙,中置半环钮,盖面饰一周窃曲纹。肩饰一周窃曲纹,耳饰两周小圆点纹,间以弦纹^[15]。河口组伴出牺首鼎、附耳平盖垂腹鼎、

垂腹圈足簋、曲柄甗形盃等,年代不晚于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以后,浙川下寺M1~M3^[16]、寿县蔡侯墓^[17]、绍兴M306^[18]均有小口罐形鼎出土,但形制和纹饰都有较大的变化。蔡侯墓称此类鼎为“炊器”,绍兴M306自铭“汤鼎”。陈公柔先生依据此式鼎常与盥缶同出,定为浴器^[19]。河口、下寺、寿县和绍兴所出,其形制、纹饰及器物组合均与汪村所出存在明显的差异。

三 龙耳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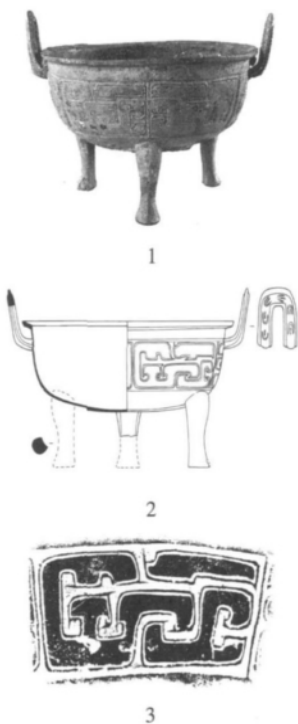
龙耳尊 大敞口,束颈,圆折肩,鼓腹,圈足。肩两侧铸接龙形耳,顾首卷尾,身饰鳞纹。肩饰一周斜角云纹,腹饰瓦纹,圈足饰一周勾连雷纹。通高28.2、口径27.8、最大腹径27.2、腹深20厘米(图三:1、2、3)。

龙耳尊在皖南还有发现。南陵县绿岭乡团结村出土1件,大敞口,束颈,折肩,斜腹,圈足较高。肩两侧铸接龙形耳,顾首卷尾,颈饰折线纹,尾饰鳞纹,脊饰云纹。

肩饰一周窃曲纹,腹饰瓦纹,圈足饰一周内卷云纹^[20]。

另皖南传出现藏上海博物馆2件,经陈佩芬等先生拼对修复而成^[21]。上海博物馆所藏形体略大,器形纹饰基本相同,大敞口,束颈,折肩,斜腹,圈足较高。肩两侧铸接龙形耳,顾首卷尾,颈饰鳞纹,身饰云纹。肩饰斜角云纹,腹饰瓦纹,圈足饰雷纹。

由平行的凹槽组成的瓦纹,初见西周中期,盛行于西周中后期和春秋时期。唐兰先生认为:“过去总把瓦纹的时代估计得太晚,根据通簋就知道穆王时代已经有了。”^[22]通身瓦纹的通簋是穆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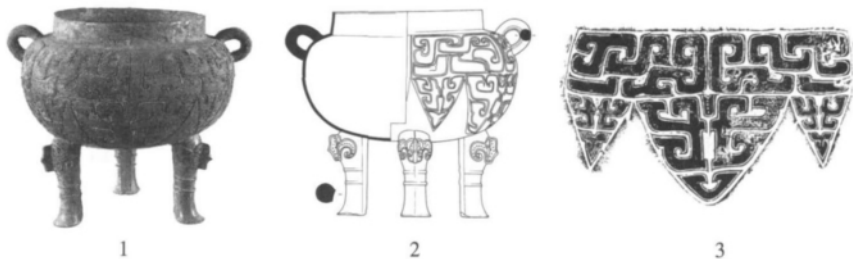


图一// 附耳窃曲纹鼎及其纹饰

1.汪村出土附耳窃曲纹鼎

2.附耳窃曲纹鼎线图

3.附耳窃曲纹鼎腹部纹饰拓片



图二// 小口罐形鼎及其纹饰

1.汪村出土小口罐形鼎 2.小口罐形鼎线图 3.小口罐形鼎腹部纹饰拓片

初期的标准器。屯溪M3出土2件饰瓦纹的圈足簋^[23],M3伴出公卣,公卣是公认的穆王时器^[24]。

龙耳尊的器体应仿自中原商代青铜大口折肩尊的式样,但在两侧铸接龙形耳,应是南方的革新。林已奈夫先生观察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所藏1件两侧饰有头向外的鸟的大口折肩尊,认为“这是在中原地区所不见的器形。如果不看两侧的鸟,其与安徽屯溪奕棋2号墓出土的青铜器尊在型式上则比较接近,它们肯定是属于同一系统的器物……在中原地区,簋之类器物以同样手法装饰鸟流行于西周中期”^[25]。屯溪M2出土折肩尊,侈口,长颈,折肩,鼓腹,高圈足。颈、足饰锯齿纹、勾连纹;肩饰蟠虺纹、勾连纹和龟形纹;腹饰蟠虺纹与勾连纹相间的纹饰带^[26]。李学勤先生认为此器沿袭了中原商代折肩尊的传统,商代折肩酒器罍也有龟形饰^[27]。施劲松先生认为屯溪M2的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28]。

宁镇区丹阳司徒出土1件折肩尊或可称为折腹尊,亦应为商代折肩尊的传统^[29]。司徒组伴出凤纹垂腹尊等,年代比较复杂。

江北区桐城市长岗村出土1件兽耳折肩尊,侈口,长颈,折肩,腹斜收,高圈足。肩部铸接一对兽形耳,双角竖立。肩饰四个凸起的简化蟠蛇纹,间以变形窃曲纹。腹饰凸起的环带纹,内填雷纹。圈足颈部饰斜角云纹^[30]。长岗组伴出重环纹球腹蹄足鼎,年代可早到西周晚期。宿州平山村出土1件龙耳圈足簋,两侧铸接对称的龙形耳^[31]。平山组伴

出球腹蹄足鼎、折沿无耳鬲、燕螭三足匜等,年代应在西周晚期。

综上,绿岭尊折肩,器体具大口折肩尊的风格,腹饰西周中晚期流行的瓦纹,肩饰皖南西周中晚期常见样式的窃曲纹,年代可定在西周晚期。汪村尊广肩圆折,腹饰瓦纹,肩饰斜角云纹,年代与绿岭尊相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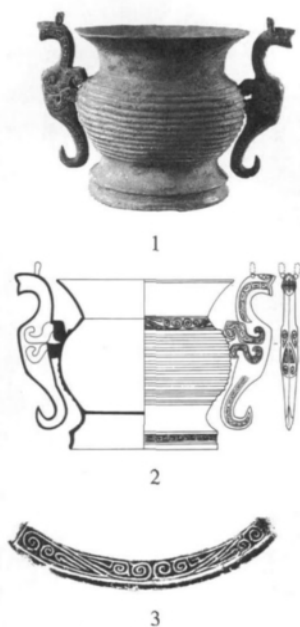
四 牺首尊

牺首尊 长圆角器腹,平底,四曲蹄足,尾作环形螭。背上开口,疑当有盖。兽头扬起,双角弯曲前伸作羊形。颈背及口沿下饰夔龙纹,颈下饰三角雷纹。通高24.6、通长29、腹宽10.8厘米(图四:1、2、3)。

牺首尊又称牺尊、鸟兽尊。宁镇区丹徒烟墩山出土一对牺觥^[32],形制与汪村尊相近。按牺觥一般作椭圆形腹或方形腹,圈足或

四足,有流、螭和盖,盖作带角的兽头形,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和牺尊不同的是,觥盖为兽头连接兽背的形状,流部为兽颈。马承源先生对烟墩山牺觥提出质疑,认为该器兽头是和器身而不是和盖连铸,觥就失去了流。同样的例子还有江淮地区出土的牺首鼎,牺首和容器连铸,盖子置于牺首后项,它们都没有流^[33]。这样看来,烟墩山牺觥似应称为牺首尊。但李朝远先生又有疑问,中原牺尊盖口皆在背上开一小口,烟墓牺觥盖在颈背且盖口一直后延至尾,又有觥意^[34]。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独特的器物称为觥尊。

汪村牺首尊和烟墩山牺觥的造型和功能近乎一致,显示了汪村和烟墩山的某种联系。铜陵县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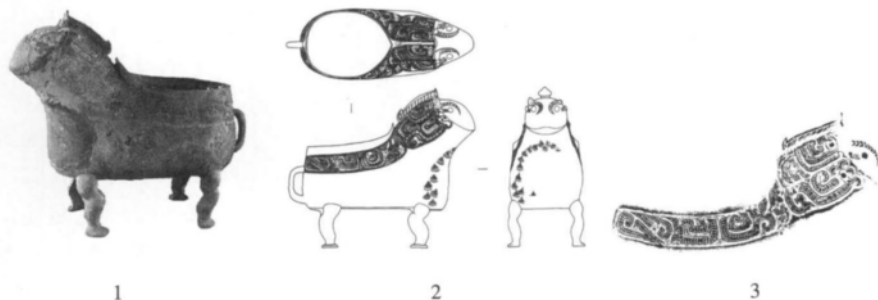


图三// 龙耳尊及其纹饰

1.汪村出土龙耳尊

2.龙耳尊线图

3.龙耳尊肩部纹饰拓片



图四// 牺首尊及其纹饰

1.汪村出土牺首尊 2.牺首尊线图 3.牺首尊颈腹部纹饰拓片



图五// 铜陵县出土牺首尊残件

现的可能来自这种牺首尊的几件青铜器残片支持了这种联系(图五)^[35],其兽头有角有耳,角为长颈鹿角,与烟墓牺觥的造型接近,曲蹄足又和汪村牺首尊相同。曲蹄四足的器物在皖南宁镇以及江北地区的发现都是极少的,在肥西小八里出土的1件龙螭匝上见到过这种曲蹄四足,它们是扁平的^[36]。因此,王国维先生说觥和匝的区别只在盖的有无,觥匝是同源的^[37]。

烟墩山组的年代在西周早期,汪村牺首尊的年代应与之相近或略晚。

五 鱼龙纹盘

鱼龙纹盘 附耳圆折,盘侧另接4个小螭手,圈足。口下和圈足颈部各饰一周云雷纹。盘内底饰蟠龙纹,龙身蟠曲饰鳞纹。内腹壁饰一周鱼纹,头向逆时针,鱼身饰鳞纹。通高9.5、口径33.8厘米(图六:1、2、3)。

皖南宁镇地区一共出土了3件鱼龙纹盘,形制都是折沿浅腹附耳圈足,蟠龙和鱼的纹饰主题、布局及其表现手法也都相一致。繁昌县汤家山出土1件,附耳圆折,圈足。口沿饰两周鳞纹。口下及圈足颈部各饰一周分尾顾首花冠夔龙纹。盘内底饰一周双身蟠龙纹,龙身蟠曲饰鳞纹,龙首两侧再各饰一组变形夔纹。内腹壁饰一周鱼纹,头向顺时针,鱼身饰鳞纹,雷纹地,上下各有一周弦纹作界栏,其下又有一周小圆圈纹^[38]。仪征市破山口出土1件,附耳圆

折,圈足。盘内底饰蟠龙纹,龙身蟠曲饰鳞纹,龙首两侧再饰变形夔纹。内腹壁饰一周鱼纹,头向逆时针,鱼身饰鳞纹^[39]。

商代的盘多为无耳圈足,西周初期仍然可见。西周以后,一般都增设双耳。双耳圈足盘是西周时期最常见的样式,主要特点是折沿,浅腹,附耳,圈足多有折边并外侈。依王世民等先生观点,附耳圆折的双耳圈足盘,主要流行于西周早中期^[40]。

鱼龙纹的纹饰主题和布局形式中原地区多见于商代晚期。安阳小屯M18鱼龙纹盘,无耳圈足式,盘内底饰龙纹,盘内口下有一周游动状的鱼纹^[41]。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传安阳出土的1件蟠龙纹盘,无耳圈足式,盘内底饰一蟠龙纹,龙首居中,龙身蟠曲,盘沿饰三组动物纹,每组一鱼、一龙、一鸟^[42]。日本白鹤美术馆藏传安阳出土的1件蟠龙纹盘,无耳圈足式,盘内中央饰蟠龙纹,盘内壁饰连续的鱼纹、虎纹和鸟纹,盘沿上伫立6只圆雕的小鸟^[43]。到了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盘饰鱼龙纹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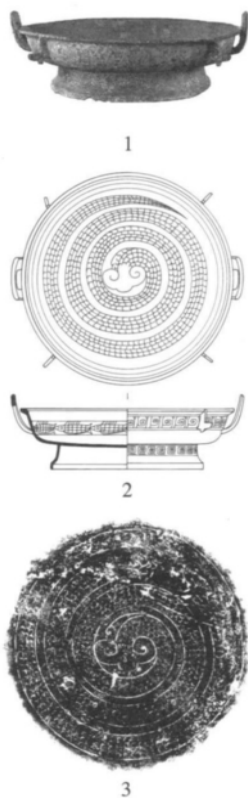
皖南宁镇地区除上述3件鱼龙纹盘外,西周中期的屯溪M3出土了1件附耳圈足云纹镂空盘,内底饰蟠龙纹,浮雕的龙首居中,龙身蟠曲^[44]。

因此,盘饰鱼龙纹,极有可能是殷人的传统,从中原传到南方并在西周时期得到保存和发展。

破山口、汤家山和汪村3件盘的年代大体相近,均不应晚于西周晚期。

根据上述各器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可以拟定为西周晚期。

经与宁镇、江北及中原地区的比较,汪村出土青铜器的文化因素可作如下的描述:附耳浅圆腹蹄足鼎所饰窃曲纹,应是中原的传统并加以变化;小口罐形鼎具地域特点,江淮地区春秋以后存在小口罐形鼎传统;龙耳尊仅见皖南地区,器体应仿自中原商代青铜大口折肩尊的式样,但在两侧铸接龙形耳,应是南方的革新;牺首尊与烟墩山牺觥的造型和功能相一致,江北区不见此型四足牺首尊,但流行造型相近的三足牺首鼎;附耳圆折圈足盘为



图六// 鱼龙纹盘及其纹饰

1.汪村出土鱼龙纹盘

2.鱼龙纹盘线图

3.鱼龙纹盘内底纹饰拓片

典型的中原形制,盘饰鱼龙纹可能是中原殷商传统在南方地区的存续。因此,汪村所出青铜器的文化面貌反映了皖南与宁镇、江北以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本组青铜器接受江北的影响或与江北区的交流和互动,可能比我们以往认识的程度要高。

刘建国先生通过江南出土的青铜鬲、甗和小口罐式汤鼎等器的比较分析,得出宁镇及皖南沿江地区青铜器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江淮青铜文化风格的认识^[45]。邹厚本先生认为西周王朝所征伐的南淮夷,正是皖南地区青弋江、水阳江、漳河以及宁镇地区的秦淮河这一水系范围^[46]。张敏先生认为汪村出土牺首尊和小口鼎,应为舒器或徐器,汪村和汤家山所出鱼龙纹盘与仪征破山口所出造型风格一致^[47]。

多数学者对通过皖南土墩墓性质和年代的研究解决皖南西周青铜器的年代与归属保持乐观,但实证性的研究进展仍然有限。与学界某些将皖南宁镇土著型器物归为春秋以后吴越体系的方法论倾向相近似,依目前的分期断代体系,与皖南区关系密切的江北区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西周缺失。江北青铜器编年存在的断层,对构建皖南沿江地区西周青铜器年代体系的影响毋庸置疑。

- [1]石谷风:《青阳出土的西周晚期铜器》,《安徽文博》1983年第3辑;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图91、110、65、64、60。
- [2]刘兴:《东南地区青铜器分期》,《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 [3]肖梦龙:《试论江南吴国青铜器》,《东南文化》1986年第2期;肖梦龙、林留根:《皖南吴国青铜器分期研究》,《青铜文化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9年。
- [4]李国梁:《皖南出土的青铜器》,《文物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1988年。
- [5][45]刘建国:《论江南周代青铜文化》,《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
- [6]杜迺松:《在皖鉴定所见铜器考》,《青铜文化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9年。
- [7][28]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64、246页。
- [8][10][12][14][40]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82~193、151~156页。
- [9][11][13][20][38]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图8、109、86、36、61。
- [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舒城县文物管理所:《安徽舒城县河口春秋墓》,《文物》1990年第6期。

- [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卷10图7。
- [17]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卷7图63。
- [18]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三〇六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卷11图152。
- [19]陈公柔:《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
- [21]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东周篇(上)图版509;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卷11图19。
- [22]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
- [23][26][44]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16、66、15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卷11图92,图88,图96、97。
- [24]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卷6图119;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第8期。
- [25][日]林巳奈夫:《关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若干问题》,《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第107~110页。
- [27]李学勤:《吴国地区的尊、卣及其他》,《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3~132页。
- [29]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 [30]江小角:《桐城出土春秋时期青铜器》,《文物》1999年第4期。
- [31]李国梁:《安徽宿县谢芦村出土周代青铜器》,《文物》1991年第11期。
- [32][39][41][42][43]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卷11图37,卷6图138,卷3图168、169,卷3图174、175,卷3图176。
- [33]马承源:《吴越文化青铜器的研究—兼论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第6页。
- [34]李朝远:《烟墩山墓青铜器的时代及其它》,《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 [35]未见著录,铜陵市博物馆收藏。
- [37]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中华书局2004年。
- [46]邹厚本:《皖南商周青铜器序》,《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 [47]张敏:《破山口青铜器三题》,《东南文化》2002年第6期;张敏:《读〈皖南商周青铜器〉有感》,《中国文物报》2007年4月11日第4版。

On the Age and Related Issues of Bronze Wares Unearthed at Wang Village, Qingyang County, Anhui

ZHANG Ai-b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Abstract: The bronze wares unearthed at Wang Village, Qingyang County, Anhui, contain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with their clear and integrated assembling and the rather new figure styl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assembling, shapes and patterns of these objects indicates that they may be dated back to the late Western Zhou, and their shape features reflected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bronze cultures between southern Anhui and Ningzhen, Jiangbei and Zhongyuan areas. These bronze ware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hronology framing of Western Zhou bronzes in the area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n southern Anhui.

Key words: Wang Village; Qingyang County; bronzes; Western Zhou; bronze culture

(本文终校:石磊)

征稿启事

《东南文化》杂志是由南京博物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1985年创刊,目前被录入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HSSCD)、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期刊……

《东南文化》于2009年改版后,定位于中国大陆东南及港、澳、台地区乃至日、韩等东亚诸国文化遗产的探索、研究、保护、展示与利用等,加强了对文化遗产从保护、研究、管理到继承、欣赏、展示诸领域的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的关注,以适应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新内容、新趋势和新要求,凸现文化遗产地位,彰显东南地域特色,并努力打造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从而推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事业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主要栏目有:东南论坛、遗产保护理论、考古探索、地域文明、博物馆新论、专题研究、域外广角等。

《东南文化》真诚欢迎专家学者投稿,尤其欢迎有关遗产保护和相关学科探索的理论文章。现将稿件格式启示如下:

一、敬请作者提供文稿的同时尽量提供电子文本。文章的题目、100~300字的内容提要、关键词、

作者单位需提供中英文各一份,并附作者简介(出生年月、工作单位、职称、主要研究方向、邮政编码)。

二、来稿以1万字内为宜,并要求文字精炼、标题准确、层次清晰、资料新颖、观点鲜明、图文并茂;引文核对准确,注释一律置于文末并注明详细出处;线图、拓片及照片质量精美,凡线图、拓片及照片为复印件的来稿,一概不用。

三、自收稿之日起,编辑部将在6个月内答复处理意见。如在此期限内未收到录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稿件并告知我刊。稿件一概不退,敬祈自存底稿。

四、本刊将已刊内容提供网站传播,为维护作者权益,免生著作权纠纷,凡不愿网络传播的作者,请在投稿时予以声明。

五、稿件请寄编辑部,勿寄个人,以免延误登记或遗失。

通信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

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编辑部

邮政编码:210016

电话:025-84806201

电子邮箱:dnwh@chinajournal.net.cn